

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几点思考

2014-01-28 / 中经专网

[摘要]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，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大环境不同、成因更加复杂，难以通过汇率升值、对外投资、签订协议等实现根本解决；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中美两国经济基本面，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受多种因素影响，中美贸易摩擦还将长期存在，个别时期有可能再起波澜。2001年～2012年，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6.9%，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总体可控。但要看到，未来一段时期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不会消除，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将加强，无论是应对难度还是负面影响都可能增加。在一定意义上，贸易摩擦问题是中美关系发展的“晴雨表”，有必要站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度，谋划好、处理好这个问题。

（中经评论·北京）今年7月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加强双边经贸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协议，但美国贸易保护倾向是否会降低、中美贸易摩擦是否会消除，仍存在不确定性，有必要加强对该问题的分析预判。

一、中美贸易摩擦与当年的日美贸易摩擦有本质区别

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于我国经济的赶超发展阶段，与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困难时期相关。大致包括产品摩擦、产业摩擦、汇率摩擦、制度摩擦等内容，直接原因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，这与上世纪70、80年代日美严重贸易摩擦极为相似，但两者又有本质区别。

（一）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

日本经济于上世纪60年代进入高速发展期，至70年代中期人均GDP已达到同期美国人均GDP的50%以上，1980年进一步达到76%，1985年虽有降低也高达64.8%；“广场协议”签署后日元大幅升值，1987年～2000年日本人均GDP持续高于美国。新世纪以来，我国经济较快增长，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但人均GDP依然远低于美国，2000年、2005年、2010年、2012年分别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的2.7%、4.0%、9.4%、12.2%。

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，相对于当年的日本，我国与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要大得多，在科技、产业等领域尚无法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，而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，无论是数量还是涉案金额，却常年在其贸易伙伴中位居前列甚至榜首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中美贸易摩擦有种提前到来的意味。

（二）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

上世纪60～80年代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，日本的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过渡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，先后在钢铁、汽车、家电、半导体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竞争力，出口美国的产品物美价廉，严重打击了美国本土企业。1978年～1980年，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均连续出现巨额亏损，1975年美国的收音机厂全军覆没。然而，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很强，2000年～2012年，美国纺织、服装、木材加工、家具、电气设备及用品的生产累计萎缩达46.1%、75.6%、28.1%、32.8%、24.2%，多为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。美国占据了产业链的顶端，在航天领域方面也拥有明显优势；石油和化学制品属“两高一资”领域，我国基本与美国错开了产业层次，有些重要产品比如聚乙烯、聚丙烯等甚至还需要大量进口。从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角度看，中美贸易的发展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，是一种双赢的选择，贸易摩擦似乎不应频繁出现。

（三）中美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结果

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经济全球化水平还比较低，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尚小，按产业链进行跨境垂直分工刚刚起步，日本对美出口及由此形成的巨额贸易顺差均由本土企业完成。进入90年代以后，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，“东亚生产、欧美消费、资源输出国供给能源原材料”的分工格局逐步形成，就目前情况看，国际金融危机也未从根本上撼动这一格局。我国立足劳动力比较优势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，主要通过加工制造参与全球分工，加工贸易占有重要地位；2005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为54.7%，2012年虽有所降低，也高达42.1%，加工贸易项下顺差常年超过总体贸易顺差。同样，中美贸易顺差也主要在加工贸易项下形成，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，其中既有日韩企业也有美国企业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中美贸易顺差是两国立足比较优势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，人民币汇率、国有企业、政府补贴等都不是根本原因。

（四）政治因素起了很大作用

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互补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不及美国，双方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开展双边贸易中获益；即使我国出口美国产品存在倾销、补贴等问题，受损的也应当是第三国的出口企业，美国消费者是得实惠的。因此，经济不是主要因素，而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因素。美国一直视我国综合国力增长为威胁，严控对华高技术出口，有关承诺也是“雷声大雨点小”，一定程度上导致中美贸易失衡加剧。同时，美国国内政治利益集团博弈竞争激烈，我国对美出口数量多、涉及范围广，有更高的机率成为有关政治利益集团推卸责任、转移视线、赢得选票的载体。

二、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风波再起

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，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大环境不同、成因更加复杂，难以通过汇率升值、对外投资、签订协议等实现根本解决；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中美两国经济基本面，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受多种因素影响，中美贸易摩擦还将长期存在，个别时期有可能再起波澜。

（一）美国重振制造业取得一定进展

2000年～2008年，美国制造业生产累计增长6.2%，远低于同期GDP增幅，17个子行业中仅有5个保持增长。此后，随着“再工业化”战略的实施，美国制造业快速扩张，2009年—2012年累计增长达15.2%，远快于同期GDP增幅，有13个行业保持增长。其中，部分劳动密集行业由多年持续收缩转向微弱扩张，纺织、木材加工、家具制造业分别增长2.6%、9.3%、6.4%，而上一阶段则分别下滑了31.4%、14.2%、13.1%。部分资本密集行业超高速增长，初级金属、锻造金属、机械产品、机动车制造分别增长34.8%、23.4%、35.1%、71.6%，而上一阶段则分别下滑了0.7%、0.4%、0.4%、18.3%。塑料与橡胶制品、非金属矿物制品分别增长14.5%、6.6%，虽低于制造业总体增速，但也扭转了危机前的下降态势；计算机与电子产品、航天、石油与煤炭制品、化学制品等优势行业在两个阶段均保持快速增长。

近年来，我国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，这些领域中美双方差距相对缩小，美国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十分警惕，2012年已在光伏电池上挑起贸易争端。同时，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，华为、中兴手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进入前5。可见，虽然中美两国经济总体仍然互补，且美国“再工业化”能走多远尚存不确定性，但美国“退”、中国“进”将增加两国产业发展的“交叉点”，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可能增多。

（二）美国试图重塑全球经贸规则

长期以来，美国一直主导着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订。近年来，美国积极参与和推动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”（TPP）、“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”（TTIP），这些协议一旦成功签署，势必形成包括全球主要商品消费市场和供给地的大自由贸易区，对现有多边贸易体制形成“颠覆性”冲击，并不断吸引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加入其中，最终形成一套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新规则。

TPP和TTIP以“高标准、广覆盖”为特征，涵盖环境保护、劳工权利、知识产权等超越货物贸易的条款，均为美国优势所在；虽然TPP和TTIP的签署难以一蹴而就，但全球贸易标准提高应当是大概率事件。同时，美国重塑全球经贸规则比较高调，为彰显决心、扩大认同，有可能拿我国出口产品“祭旗”，强化以其国内法为依据的技术绿色贸易壁垒，相关领域的中美贸易摩擦恐难消除。

（三）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继续此消彼长

受国内外发展环境与条件变化影响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，但经过努力后维持7%左右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这个速度无论是相对于全球经济增速，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之中，都是比较高的。事实上我国在2013年～2020年保持6.8%的年均增长，即可实现到2020年经济总量“翻一番”目标。未来几年，美国经济仅能够维持2%～2.5%的年均增长，因此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还将以一定的速度继续缩小。

一般来讲，经济总量越大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就越强，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越大。伴随着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，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在一些领域发生矛盾甚至冲突；受此影响，美国对华政策恐将持续摇摆，既有合作之需、又有抑制之意。这既是其牵制我国崛起和干扰国内产业、企业、技术发展的重要手段，也是其平衡国内朝野关系、府院关系、利益集团关系的方式之一。因此，政治因素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不但不会消除，个别时期甚至可能增强。

（四）一些旧有问题尚未解决

2009年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，中美贸易顺差由上年的1708亿美元缩减到1434亿美元，此后又趋于扩大，至2012年已高达2191亿美元，仍互为彼此最大的顺差与逆差来源地。考虑到经济全球化还将继续深入发展，全球分工格局也未出现根本性变化，加之美方是否能真正扩大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尚存不确定性，中美贸易顺差依然会持续存在，始终是美国强化保护主义措施的一个借口。

2005年汇改以来，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25%，目前已基本处于合理均衡区间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，汇率弹性日益增强。然而，人民币汇率问题仍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清单之内，只不过表述变成了“避免竞争性贬值”。其背后含义是，人民币汇率不能主动贬值，同时如果美国出于国内因素推动美元贬值，人民币“需要”对美元升值。在全球经济与贸易低增长的大背景下，人民币汇率还会是中美博弈的焦点之一。

此外，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以“违反防止武器扩散机制”为由，对包括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、保利集团等在内的多家企业实施制裁，被制裁企业将不允许与美国发生任何贸易和技术往来，表明中美两国的制度摩擦正在向新的领域延伸。

三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

2001年～2012年，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6.9%，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总体可控。但要看到，未来一段时期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不会消除，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将加强，无论是应对难度还是负

面影响都可能增加。在一定意义上，贸易摩擦问题是中美关系发展的“晴雨表”，有必要站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度，谋划好、处理好这个问题。

（一）以礼相待，做好自己的事

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我国作为经济发展上的“追赶者”和规则制定上的“后来者”，在处理包括贸易摩擦在内的双边关系时，首先需讲“礼”、先礼后兵，既不示弱也不逞强，着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要完善国内产业政策体系，加强财税、金融、投资、土地政策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，多运用税收、创投等市场化手段加以支持，多采取法律、法规等方式加以规范，少使用针对企业、一般消费者的直接性财政补贴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，不授人以柄。立足我国实际，积极稳妥推动环保、知识产权、政府采购等领域的改革与制度建设，逐步缩小与国外高标准的差距，减少中美制度摩擦。在继续推进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同时，进一步发掘其他既有机制的潜力，多利用APEC峰会等多边场合，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，并就TPP、贸易顺差、人民币汇率、区域合作等问题与美开展交流，提出我方合理主张，促使美方形成“礼后有兵”的预期。

（二）针锋相对，出了事不怕事

过去一段时期，我国出口比较依赖美国市场，处理贸易摩擦难免有些被动；未来随着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推进、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，应对同样的问题，采取针锋相对策略的条件更加具备。类似于处理中欧光伏摩擦，针锋相对是手段不是目的，目的是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前，从而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。从趋势上看，若美国重振制造业取得很大进展，中美产业出现趋同，则双方贸易摩擦必然加剧；在这种情况下，躲无可躲、退无可退，如果不针锋相对、以打促和，那么很可能导致国内产业发展严重受损，甚至可能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。就已往经验看，美国对华利益很多，多年前的中美知识产权摩擦，美方就因忌惮福特等大企业在华投资利益受损，而不得不做出妥协；因此，选择一些领域，让美国“疼”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当然，也要“有节”，始终注意手段和目的的区别，避免打贸易战。

（三）因势利导，把坏事变好事

任何事物都有两面，中美贸易摩擦、全球贸易标准提高和外需放缓类似，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、外贸发展方式的冲击，是一种“倒逼”压力。因此，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以开放促改革、以改革促发展的思路，因势利导、化危为机。目前，我国正在与多个国家开展FTA谈判，比如中韩自贸区等，许多已签FTA还需要不断深化，比如中国—东盟“10+1”等；可参考TPP、TTIP，选择合适载体，比如成员国与TPP有交叉的FTA，择机提高条款标准，加入环境保护、知识产权、政府采购等内容，给国内产业、企业提供明确信号，倒逼转型发展。同时，要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落实体制改革、环境保护、节能减排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改善民生等重点任务，从根本上减少贸易摩擦、贸易标准提高的不利影响。

（《宏观经济管理》，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私人银行部，张哲人，彭华）